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 东北亚国际关系

沈丁立

内容提要：从 2007 年起，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美日三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这三国的综合国力均在世界前列，在东北亚更具显著优势。全球化时代，中美日三国在本地区凝聚着更多利益交汇，同时，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研究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核心是抓住中美日三个主要行为体，并以东北亚存在的两大冷战遗迹为线索，通过分析朝鲜半岛与中国台湾两对分裂与统一的矛盾，构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在矛盾形成和演化中的作用，从而增进三国间战略互信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共荣。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 东北亚 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东北亚的冷战遗迹

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首先需要确定主要行为体。在整体上，美中日三国是这个地区的主要行为体，其中尤以美中最为重要。美国虽非地理上的东北亚国家，但由于它在这个地区的广泛利益和实质性存在，在研究东北亚问题上无法忽视美国。于是，在东北亚诸实体的六国七方再加美方的集合中，

《当代亚太》2009 年第 2 期，第 5～19 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集中了世界上最具分量的一些行为体。

就经济产出而言，美日中已分列世界前三。就综合国力而言，美中俄日四方均在世界前七，这四国的年军费投入也列世界七强。除蒙古国是单国无核武器区外，东北亚的其他五国六方或已是核武器国家，或曾经发展过核武器。可以说，如果考虑经济、防务等传统国力指标的话，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最具硬实力的地区。

研究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必须研究这一地区特有的两大矛盾。众所周知，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国家间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冷战的两个残留痕迹都存在于这个地区。矛盾之一，是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为此，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半岛曾爆发美中苏都参与的大型热战，三年中交战双方的伤亡兵力达数百万。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长期对立，各自寻求核武。韩国在20世纪曾一度启动过核武器计划，而朝鲜已取得核武器技术，其弃核还在反复之中。关于朝鲜弃核的“六方会谈”再次陷入僵局，平壤关于弃核的矛盾心态以及各方围绕于此的博弈，都已清晰地表现在世界面前。另一个冷战矛盾，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长期化。围绕着中国台湾前途的国际斗争，长期以来妨碍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信任建设。中国大陆依照国际法的主权原则，坚持认为完全有权自主处理台湾问题，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权干预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一切中国国家主权。但是，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竞争的考虑，长期将自身利益置于国际法之上，以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干涉台湾问题的解决。即使美国行政部门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

六国为中国、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国这六个国家行为体。中国台湾则为非国家行为体意义上的实体。

《国家统计局2007年GDP最终核实同比增长13%》，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15日；马小宁、吕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作用超越排名》，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19日。

按官方汇率计算，2007年世界前七位军费大国为美国、英国、中国、法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参见 *SIPRI Yearbook 2008: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78；该次序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1月20日发表的《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所述的中国军费在定性上不矛盾。此外，关于俄罗斯的数据是估值，实际可能更高，介于英国和中国之间。

See Joel S. Wit, Daniel B. Poneman, and Robert L. Galuchi, *The First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Going Critical*,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2004; Yoichi Funabashi, *The Peninsula Question: A Chronicle of the Second Korean Nuclear Crisi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2007.

美国立法部门仍以法律确认美国在台及周边地区利益。美国国会通过颁布《与台湾关系法》，将自身的特殊（然而不当）利益凌驾于他国正当利益之上，表示为了保卫美国的利益，保留不接受以对美国不利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利。

在深度和广度上，中美当前正在开展的交流与合作已达前所未有的水平，中美两国关系被广泛视作新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但是，中美两国在台湾前途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仍深刻制约着中美之间的相互信任。显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一是为了确保朝鲜半岛的稳定，二是为了确保具有协防台湾的能力，并在需要时使用这种能力。相应地，中国大陆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将美国当作最大的外部障碍，不得不以消极的态度看待美日安保的作用，并在相当程度上推进防御能力的建设。中方建设威慑力的努力，使 2007 年 1 月中国针对自己在太空的废弃卫星所进行的“实验”，一度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也使中方在 2008 年 9 月进行的神舟七号载人空间活动被西方防务界视作具有军事色彩。

美国尚未全力对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既因为美国现有的防务资源用来对付中国仍显有余，也因为在过去七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国必须先将国家力量用于对付首要安全威胁，因此必须强调同中国等国的反恐合作。但是，刚下台的布什政府仍对俄罗斯、中国与印度等的崛起给予了警戒，只是在其前后两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这种因崛起而带来的“威胁”置于靠后的地位。即便如此，近年来美国政府已更多重视地区力量平衡，开始着意发展同印度的战略合作。在美国行政部门的竭力推动之下，2008 年美国国会、核供应国集团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分别通过了《美印核协议》，同意两国进行民用核能合作并为此实施安全保障。美国借此放宽对印度核武发展的限制，提升印度的经济竞争力，从而利用印度加强美国在亚洲实施的力量平衡。

东北亚的安全矛盾与权力争夺，并不局限于历史上的美苏争霸与当前的美日中竞争，还由于这个地区的同盟政治而更为复杂化。尽管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本意是针对它所感知的美国的敌意，但由于中朝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结

See Taiwan Relations Act (Public Law 96-8), enacted April 10, 1979.

Shen Dingli, "China's Defensive Military Strategy: the Space Question", *Survival*, Vol. 50, No. 1, February-March 2008, pp. 170-176.

盟，而中国也因此对朝鲜产生了一定的杠杆作用，所以劝阻朝鲜发展核武器、进而促成国际防扩散与地区稳定，必然成为美国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某种期待。中国也确实妥善处理了作为盟国的身份与在国际事务中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之间的平衡，为促进朝鲜弃核付出了积极努力。

当然，朝鲜对此可能愿意听取但未必完全接受中国的意见。因为朝鲜对核武器的政治作用有其现实看法，而且，源于冷战期间所确立的中朝盟约中的军事部分，目前也可能已名不符实。冷战结束后，中国一再反对同盟政治，中朝盟约可能已无法承担其当年所肩负的使命。如果确是如此，这无疑会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进步。但与此相应的是，国家间政治的现实主义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消失，上述情况也可能导致中国劝阻朝鲜弃核的影响力有所降低。

同时，美日军事同盟在阻止日本开发核武器方面，仍然起着制度性的保障作用——不知道这是现实主义的成功，还是理想主义的悲哀。但对于台湾问题，日本一方面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确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行为必然受美国的影响——日本或者顺应美国立场从而损及中日关系，或者为了外交独立而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相冲突。近十年来，人们更多看到日美加强安全同盟。日本表示将在其周边地区根据具体情形确定其在日美盟约中承担的责任是否具有可实施性，这容易被中国大陆解读成日本试图告诫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保持谨慎——或者这本来就是日本的意图。因此，东北亚国际关系除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之外，还有着由于日美盟约而产生的中日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摩擦的次级矛盾。

中美关系以及发展前景

中美关系的内容十分广泛。在战略层面，中美双方的矛盾发生在台湾问题上。两岸统一与否，要么涉及中国由于未实现统一而继续受到牵制，要么

1961年7月11日在北京签署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表明了中朝之间的防御性同盟关系。

涉及由于中国实现统一而使美国感知它在亚洲的主导作用可能受到牵制。这就必然构成矛盾。在政治层面，中国采取何种发展道路以及能否成功，更关系到向世界提供何种仿效和示范的作用，涉及美国主张的民主资本主义与西方眼中的中国式发展道路的竞争。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着“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竞争，或“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竞争，事关世界未来可能的走向。

毫无疑问，在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美相互合作与包容的能力已大为提高，两国经济制度中的共通性显著增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修正了中国在上传统上对资本主义的诠释。新的观点是：传统上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特质的经济行为未必仅限于资本主义，而传统上被认为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经济行为也未必仅限于社会主义，两者都可能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全人类共通性质。尽管《中国共产党章程》仍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但美国并不认为这会构成对其资本主义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国总理温家宝在 2007 年表示，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将近半个世纪内，中国仍未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马克思和列宁在其经典中谈论的社会主义，因此离开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相当距离。确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完全停止对外输出革命，回到了更为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一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法体系的道路。

在本质上，美国仍然坚持反对集权专制，反对共产主义，但这不表示在国家安全利益面前，美国不具有现实主义的灵活性。冷战期间，美国曾同中国进行战略协作，共同牵制苏联的对外扩张。进入 21 世纪，美国再度与中国等国合作，共同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同时，中美开展了广泛的经贸合作，2008 年中美双边贸易已高达 3300 亿美元，这对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表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甚至是有着严重冲突可能的国家之间，仍然可能寻求合作点，扩大共同点，克制矛盾的

See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re, London, May, 2004.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 年 9 月 12 日；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2007 年 2 月 27 日。

在 2009 年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就职演说中，他仍然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并进行攻击。

爆发，从而扩展双方的共同利益。

在美国看来，今日的中国已不复昔日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保持了相当集权的日益信奉市场原则的民族主义国家。由于中国距离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尚有时日，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尚不构成现实威胁。在美国主流阶层眼中，对美国价值观和其他利益形成威胁的，是中国的政治形态以及这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提高。历史表明，美国无力单独有效地对中国施行遏制，于是在一个具有多元威胁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接触合作与防范遏制并举的方针。美国希望借由全球化在中国产生的内外压力，促使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最终向西式代议制和平转化。

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经济以每四至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军费增长几乎每四年翻一番，而国家财税增长更是几乎每五年翻两番。自 2000 年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国力提升进入高速轨道。与此同时，中国遇上特殊机遇：乔治·W·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并且美国遭遇九一一恐怖袭击。之所以称机遇，是由于美国国内遭受如此打击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美国对此做出的反应出现战略性错误——将恐怖主义打击定位为首要威胁，并将武力报复扩大化，入侵伊拉克，从而导致极为严重的内外危机。

因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在总体上取得了十分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由于在九一一事件后重新定义了安全威胁的排序，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分别将反恐、防扩散、地区稳定列入美国安全政策的前三位，因而将中俄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放在对美国安全形成压力的第四位因素。在前三位威胁中，美国都需要同中国取得安全合作。而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这种格局不会马上改变，尽管他已表示反恐战争不会永远是美国政府的外交主题。

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寻求中国的合作，在中阿（富汗）边界控制、金融流转监控、允许联邦调查局官员公开派驻北京等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合作。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在制止朝鲜研发核武上，美国取得了中国劝阻朝鲜发展核武并且主办旨在促使朝鲜弃核的“六方会谈”的合作。虽

《2007 中国外贸首超 2 万亿美元，顺差为 2622 亿美元》，中新网，2008 年 1 月 11 日；俞岚：《商务部：2008 年欧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新网，2009 年 1 月 15 日。<http://www.chinanews.com.cn>

然朝鲜尚未真正弃核，而且由于朝鲜现实主义的安全感知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也未必能够有效劝阻朝鲜尽快彻底弃核，但在促进朝鲜弃核和增进东北亚稳定的进程中，中国已经体现出领导性的负责作用。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也在自身国际责任与发展中伊双边关系之间取得平衡，在多边和联合国舞台上体现着更为全球性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增量。在美国关注的中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反恐与稳定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利益交集也在逐步扩大。

即使中国正在崛起，美国也自知仍然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潜在消费市场，因此必须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合作关系。中国一年 2000 亿到 3000 亿美元的对美出口，本质上是在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求。美国需要中国在继续对此予以满足的同时，提升对消费美国产品的需求，并提高中国对美出口在环保和人权等方面的价值附加，要求人民币升值。对此，中方已给予合理考虑。目前，双方还在考虑实施在环境与能源领域的长期战略合作。进入 21 世纪后，中美关系度过了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互动合作阶段。

在两国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中美合作也在增加。陈水扁在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后，仍试图推行急性“台独”，促成了近年来中美双方在反急性“台独”问题上的一定协作，殊为难得。这也帮助稳定了中美在过去几年中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两国政府与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中国经济产出能力虽显著上升，但现在也仅为美国的 1/4，人均仅为美国 7% 左右，远不在一个量级，更不足挑战美国。中国经济的快速进步，既取决于中国选择改革开放，也得益于美国选择与中国的经济开放进行合作。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这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合作的成功典例。中美双方并未摒弃意识形态分歧，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务实合作。这一共同利益，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外部资金以及技术与管理，并利用中国丰富与廉价的劳力，进行制造业生产，共同创造与分享新的财富，并在中美两国间进行新创财富的互利性分割博弈。中美由此产生紧密相连的经贸关系，使得双边关系趋于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争议，则是利益分配公平性的问题，是如何而非是否合作的问题。

随着中国台湾在 2008 年 5 月完成二次政党轮替，目前两岸关系已显著趋缓，台湾问题在当前引起中美严重冲突的可能性下降。中美各自整军备

战，在现实中虽可能将对方互设为竞争者，但两国因安全利益分歧而迫近战争边缘的可能性已大为下降。应该说，布什总统领导美国的八年间，中美尽管经受了2001年撞机事件的挑战，但两国关系整体上仍是建交以来发展最为平稳的时期。美国两党对延续这种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已基本达成共识。在后布什时代，维护和发展两国之间战略稳定的趋势将不会逆转。

中日关系以及发展前景

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尽管日本的经济产出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日本人口不到美国一半，但中日双边贸易近年来达到中美同期的75~80%。在华投资经商的日本企业在投资量和销售额上都堪与美国投资媲美。当代日本与中国的经济互动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产生深刻的影响。

可是，中日关系的发展未必比中美关系的发展更为顺利。长期以来，中国将美国视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即使是美国向中国台湾输出武器而当代日本并没有向中国台湾输出武器，中国许多民众仍由于历史等问题对日本有着更多的反感。类似地，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代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冷感也是高居不下，形成了双方在交流沟通并达成相互谅解方面的重要障碍。可以说，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十年中，中日民间的相互可接受度持续处于较低的状态。

在双方的核心关切上，即在中国关注的反“台独”问题上，以及在日本所关注的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中日双方的立场都难以使对方满意，两国的态度尚不足反映“战略合作伙伴”的契合。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当前并未寻求急速统一，体现出愿意维护现状的态度。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当局表现出加速推动独立的倾向，引起大陆的强烈不满。在这个问题上，两岸政治斗争日趋激烈，以至于中国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以法律形式表达反对台湾法理独立的意志，而台湾方面则在陈水扁期间，“冻结”国家统一纲领（国统纲领）和国家统一委员会（国

《2007 中国外贸首超 2 万亿美元，顺差为 2622 亿美元》；俞岚：《商务部：2008 年欧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参见朱锋：《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3 期，第 16~25 页。

统会)，继续“去中”化进程。

反“台独”不仅是中国的合法诉求，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期待。同中国建交的世界各国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中国合法利益的支持，但日本对此问题却持暧昧态度，可能使中国方面感到失望。确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此问题的表态也有保留。美国总统在与中方谈话时，也曾明确反对“台独”，但在公开场合却经常仅表示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独”也是日本政府的政策，而不是中方所希望的明确反对“台独”。不支持“台独”与反对“台独”存在区别。不支持“台独”，逻辑上也可能意味着不反对“台独”。由于中日之间近百年的困难关系，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尤其敏感。日本在 1894 年发动甲午战争，次年侵占台湾。日本在 20 世纪大规模侵华，并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1972 年中日关系正常化时，日本“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没有明确接受。在 1945 年日本放弃台湾时，却并未放弃台湾的地理附属钓鱼岛，从而产生了今日的中日领土纠纷。作为百年前蒙受日本侵华灾难并被迫割让台湾的中国而言，要求日本清晰表达中国重新拥有台湾的立场，具有正当性。事实上，正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武装干涉以及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产生的威胁作用，才使得中国对日本的台湾政策十分敏感。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府在中方要求下，曾表示其保护海上交通线的使命不包括台海地区。但在 20 世纪末日美修订安保条约后，日本却通过《周边事态法》，并在对周边的重新定义中，既不明确包括台海，也不明确排除台海，而是认为对于新安保条约是否适于台海区域的问题，应取决于未来的具体情形，而非事先一概予以排除。近年来在日本国内、军内的言论中，时有认为日本“周边”应该包括台海的议论。这不可能不使中国有所担忧。

相应地，在日本的核心利益问题即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71 年 9 月 29 日，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第三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其中，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日本只是“理解和尊重”，而非明确接受。1945 年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要求遵守《开罗宣言》，并把日本国土限制于本州、九州、北海道和四国以及其他一些由《波茨坦公告》缔约国中美英三方所决定的小岛。1943 年的中美英《开罗宣言》表示：由日本窃占的中国所有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中国东北，均需归还中华民国。所以，日本接受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后又同中国大陆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在台湾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留有伏笔。

（“争常”）的问题上，日本仍无法逾越中国这一关。由于在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上，中国无法放下对日本的戒备，或者说由于日本首先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有意妨碍中国的合法利益，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也延伸到了日本“争常”问题。在小泉时代，日本即使为了“争常”，也曾不屑与中国协商。迄今，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尚未支持过日本的“争常”提案，理由是其地区代表性不够。如果这种“不支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反对，那就可见在东北亚的中日矛盾已经到了彼此抗衡对方核心利益的地步，反映了对彼此主权完整，或在地区和世界领导地位问题上的间接排斥，其性质不无严重。

近十年来，中日两国部分民众彼此反感，不仅反映了双方领导阶层和各自主流媒体对彼此价值观的难以接受，也反映了各自对转变中的东亚和世界格局的展望，以及中日对未来相对地位竞争的预演。民众的意见，主要是通过媒体的塑造而形成，当然民众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作用于媒体，并在全球化时代更有可能制约精英层的决策。

一方面，中国多数民众难以接受部分日本精英对 20 世纪日本对外侵略历史的否认或者其他不妥处置，并且容易得出简单化的结论：当代日本也许是个美化历史、失去道义的不正义国家。进而还可得出推断：这样的国家不值得尊敬，更不配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大责任。这样的假定，很容易从日美安保条约威胁中国、日本声称对中国钓鱼岛拥有主权、日本图谋中国东海领土与资源、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出版有争议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日本谋求重获建军权和对外使用武力权等方面取得佐证。

但是也要看到，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未以任何方式对外使用武力。日本战后在教育、经济和科技上取得了高速发展，援助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对联合国提供了较多的会费和特别费用。当代日本还贯彻环保节能，在同等的经济规模上为世界节省了大量能源。日本也较美国更早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率先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而且自中日建交以来从未向台湾提供过武器。

日本在过去曾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但中日之间现有的问题，有些与中国自己在过去与现在的行为有关。对今日日本民主建设的成就认识不够或不愿承认，只会妨碍我们确立正确认知。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损害远不如美国，而中国往往能够从大局出发处理对美关系，而对日则更为严厉，其中就有一个历史记忆问题。如同其他民族，中国人也善于集体记忆民族身份与

仇恨，不过，我们也应用同样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他国家的问题，包括严以律己。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日本有些人士也是透过有色眼镜，有选择地进行过滤。在他们看来，中国仍然奉行专制，这是当代中国不能被他们所接受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愿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提高，反而认为集权力量的上升意味着对民主的威胁。他们不愿看到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中国的进步，反而担忧中国的逐步强盛将可能挑战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经济主导。他们只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能源使用与环境生态正面临严峻挑战，而不愿检讨在几十年前日本也曾面临严重公害。他们只看到中国军力快速成长并缺乏透明，但不愿承认这是由于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国家追随美国意欲干涉台湾问题而引起的合理反应。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同民主与自由格格不入，需要日本来教化或者联合其他国家来集体性地防范。

在中日两国民众中，如上所述的偏颇见解，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日本是存在着一些对历史的错误认识，但在民主和民生建设方面都已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同样，中国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在民主和民生发展的道路上也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式的威权管理，有其历史必需，也在发展中国的同时，使整个亚太地区包括日本享受着由于中国稳定而产生的益处。中日两国需要走出相互之间缺乏宽容的误区。

中国需要认识到：在日本侵华的历史过程中，有些中国人可能也需要对此承担一定责任。由于朝鲜发动统一战争而导致驻日美军驰援，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日清算，也是历史的遗憾。在造成日本某些人士今天对历史问题认识不清的问题上，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也都有历史教训应当汲取，至少各自都因安全原因而对日放弃索赔，造成永远的遗憾。还需认识到：虽然日本在二战之前以及期间对中国造成了严重伤害，但在战后却是美国比日本对中国形成了更大的挑战。中国在处理美日对台政策时，应该以客观利益为标准，而不应受民族感情左右。中国还需要注意：中日之间有很多问题可以类比，我们宜采取相同标准，依据事实，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于日本，也需要认识到：历史上毕竟是中国在文化上有恩于日本，是日本欺负了中国，而不是中国欺负了日本。因此，在历史问题上长期坚持歉疚谨慎的态度，才能反映当代日本的政治正确和理智负责，才能树立当代日

本的积极正确形象，才能得到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谅解。当代日本受到世界的广泛赞誉是事实，那是因为战后日本在废墟上重建，取得了民主和民生的重大成就，并且有益于世界各国。但日本始终无法取得中国、朝鲜和韩国的由衷谅解，并非由于三国有意为难日本。事实上，中国台海两岸以及韩国都已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尽了最大诚意，希望同日本彻底了结这一段沉重历史。但是，恰恰是对这三个受害最深的近邻，日本未能展现应有的诚意，不能体会长期坚持歉疚谨慎的政治和心理必要。因此，往往是日本主动恶化同邻国的关系。日本不能处理好与重要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德国在战后长期坚持歉疚谨慎的对外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使中朝韩一些民众对日本更加不满。日本或多或少能够处理好与当年受其侵害较少的国家或并未受其入侵的国家的关系，却始终不能处理好与当年受其侵害最深国家的关系，主要原因不在中朝韩，而是日本自身，这是日本的弱点和耻辱。日本若不能对此正视，其缺陷国格将可能使其继续在世界舞台上遭遇严重挫折，其谋求世界领袖地位的核心利益将难以实现。

中日之间存在着很多问题，一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争执，另一部分是如何看待争执的问题。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善，将严重影响双边关系。如果双方都能正确对待这些问题，也完全可以大事化小。譬如，日本有些人士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不清，当前并不会对中国造成多少实际利益的损失，反而是损害当今日本自己的形象。又譬如，美国仍然奉行对台售武政策，但日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应该比美国更受中国的肯定。采取重实质而少重感情、重正义而少重功利的对外方针，应该是成长中大国外交成熟的表现。

值得肯定的是，即使中日彼此间存在着许多伤感情或相互鄙视的情况，也并不影响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普遍感知。对于参拜靖国神社与否，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曾表示：中国是日本的朋友，而日本不能做朋友不喜欢的事。他没有表示参拜本身是否正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遗憾；但他不去参拜的理由是为了维护中日友好，这就值得我们尊敬。对于东海领土争议，两国政府的政策底线都是避免发生武装冲突。尽管可能存在显示武力的意图或行为，但也仅是为了寻求谈判时的有利地位，而无意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中日应继续采取这种理性行为，并将其演绎为两国处理广泛的双边与国际事务的普遍准则。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

如上所述，美日中是东北亚的三个核心作用者，而朝鲜半岛与台海两岸的统一与分裂，则构成了作为冷战遗迹的东北亚核心矛盾。在这两场矛盾中，一场与中国直接有关，另一场与中国间接有关。在台海矛盾中，中国长期未能实现国家统一，成为矛盾的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上述两场矛盾是相关的。没有朝鲜战争，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可能不一样，而台湾问题也许就不那么成为问题。朝鲜半岛分裂与统一这对矛盾的解决，从根本上取决于朝鲜半岛人民的意愿，但在矛盾解决之前，它也可能成为台湾问题复杂化的因素。

美国作为区外作用者，深度介入甚至部分挑起了这些矛盾。美国可能是中国未能统一的获“利”者，但它也因此无法获得广大中国民众的支持而成为失利者。在当代国际事务中，不能得到 13 亿中国人民基于事实和国际法的尊重，是任何国家争取最根本和平的失败。美国希望借此取得长时间的和平，但它事实上面临中国政府与民众的长期反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提出的发展战略的最终外部目标，还是要改变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现状，而不是永远维持现状。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干涉和领导，也表明美国在该地区并未得到根本的和平。来自美国的敌对，已经先后塑造出中国与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东北亚的权力制衡与和平，即使是非对称的，也不是美国所希望的美帝国治下的和平。

日本在这两场矛盾中，其作用相对有限。日本并未引起这两场矛盾，它通过与美国结盟不限制中国核心利益的意图，但其自身的核心利益也为中国所质疑。日本并未直接卷入朝鲜战争，但作为美国盟友中的一员，也付出了被朝鲜绑架人质的代价。总体而言，日本没有从东北亚的根本矛盾上取得政治净得益。

随着全球化快速发展，美国和日本在战后先发的领先优势在逐渐失去，而中国和印度等后发国家人多人穷的传统劣势正一跃成为吸引外包的优势，

对这两对矛盾间可能的一些关联，参见 Shen Dingli, "North Korea'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China", *China Security*, World Security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Autumn 2006, pp. 19-34.

成为工业化先进国家争相投资的热土。近年来的宏观统计指标反映，在东亚和世界的经济与综合实力排位中，出现了对中国有利的新调整。相应地，二战结束以来在东北亚地区积聚的两场矛盾，也就有了更多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实现缓和的可能。随着中国近年来成长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前列国家，中国大陆在事关核心国家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继续受到美国非法侵犯的情况，必将有所改观。中国并不见得必须要以新增的军事能力对抗美国，而是美国被期待在变化了的环境中更加务实地尊重中国，更加谨慎地避免触动中国的合法利益，更加主动地制约可能给其带来战祸危害的急性“台独”风险。当美国以更加尊重中国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时，急性“台独”势必受到更多遏制，而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的消极制约作用，也势必有所消减。

朝鲜半岛分裂与统一的矛盾，与台湾问题是关联的。鉴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严重对抗性的削弱，以及中日冲突可能性的下降，将有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助于中国在处理半岛事务时，更少受到台湾问题的牵制，这对美日无疑也是有利的。因此，在展望东北亚国际关系时，考察主要行为体，抓住地区核心矛盾，就能透视整个地区的安全概貌，纵览地区各国各方安全政策的建构。

目前，东北亚国家已就上述两大矛盾达成不成文的共识，即最基本的共同政策。对于台湾问题，各方的基本政策是维护台湾“不独不统不武”的现状，尤其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各方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大陆也以和平统一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首选政策。各方立场之不同在于：尽管都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不都完全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即在中国主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范围的完全重合性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另一分歧在于对台湾前途的实现途径：中国大陆认为国家必须统一，而且尽管和平统一是优选手段，仍不能排除以其他手段来处置法理分裂事件；美国和日本可能都认为只能接受和平前景，即台湾与大陆或和平统一或和平分裂；美国行政部门的立场是和平维护现状，包括和平的未统一现状。

中国与美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是根本的，但双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日益减少。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台湾已实现二次政党轮替，马英九上台。马英九政府依据其法统，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是两个政权的关系，而非两个国家的关系。二是由于中国大陆具有理性，在威慑“台独”的同时，避免引发武装冲突；而且，美国政府反恐吃紧，避免与拥有核武器的

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也符合美国当前利益。三是随着中美力量消长，中国大陆在主导台湾问题的演进时，将更具主控力。

同样，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关各方也已达成一定共识。一是朝鲜半岛统一符合南北双方利益，但必须寻求协商而非武力的方法达成。二是半岛无核化，南北双方都不应发展核武器。三是各方的正当安全关切应得到尊重，朝鲜弃核与美国放弃对朝鲜的敌对互为前提，因此朝美之间应该采取“行动对行动”的方式，相互解除敌意，以促进弃核和半岛安全。

鉴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朝鲜的现实主义考虑，它的弃核进程是缓慢甚至是反复的。在极端情况下，朝鲜终止弃核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六方会谈”提供了过程性的接触平台，使得各方可就稳定半岛局势与东北亚安全形势进行会商。这才是“六方会谈”真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之所在。中朝与美日韩这两个不同同盟体系的国家，再加上朝鲜过去的盟友苏联的合法继承国俄罗斯，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已就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多年的多边性磋商，开创了东北亚安全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处理的历史，并获得了实践经验，这为安全利益一致或分歧的国家经由多边制度安排寻求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还会加深。无论是分享共同利益，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促进中亚地区的稳定；还是分担共同灾难，如各国共同承担化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担；国际社会合作的趋势都在加强。东北亚本来就存在一些世界顶级的经济实体，早就开始了相当广泛的经贸合作。正是这些经济与文化合作，使得这一地区的行为体更有意愿去规避相互间可能的严重政治与军事冲突。但是，东北亚地区残存的冷战遗留矛盾，也在长时间地侵蚀着相关各国的互信。这一局面，有望通过全球化本身，以及通过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力量与关系的调整，逐步得到改善。

Sino-US Relation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Shen Dingli

Abstract :As of 2007 , by virtue of three decades of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 China has joined the rank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o form the top three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Each of the three states '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lso tops the world ' s list ; their obvious strengths ensure that they become major players in Northeast Asia. Indeed ,in this age of globalization , the three states have found themselves increasingly drawn into the region , where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converge. Nonetheless , many problems still plagued Sino-U. 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o crea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dynamics in Northeast Asia , this paper review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with respect to these three states , and their relations vis- à-vis the two major remnants of Cold War in the region :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analyzing the two cases , this article seeks to unpack the roles played by Sino-U. 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two issues , from their origins till today. This analysis is made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strategic trust amongst the three states , and with it , the peaceful co-prosperity in Northeast Asia.

Keywords :Sino-U. S. Relations /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North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thor :Shen Dingli , Director and Professor , Centre for American Studies ; Executive Vice-Dean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Fudan University